

林士民 著

# 再现昔日的文明

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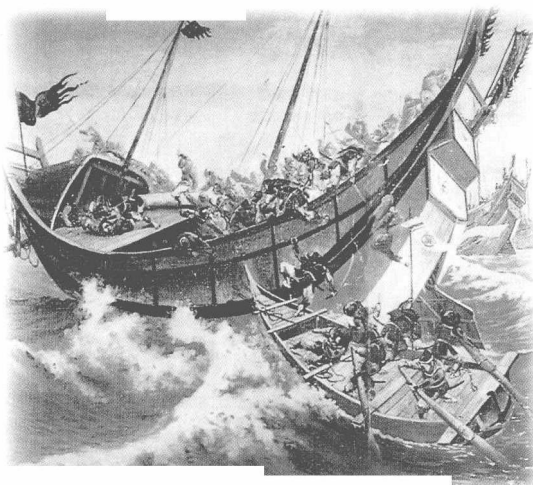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赠书

林士民 著

# 再现昔日的文明

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Lin Shimin (林士民) and a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below it.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林士民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11

ISBN 7-5426-2218-8

I.再... II.林... III.文物-考古-研究-宁波市 IV.K8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2413号

## 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

---

著 者 / 林士民

特约编辑 / 盖国梁

责任编辑 / 陈宁宁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盖 天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徐曙蕾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mailto: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昆山市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850千字

印 张 / 34

印 数 / 1-2100

---

ISBN 7-5426-2218-8  
C·120 定价:168.00元(精)

# 序

毛 昭 晰

林士民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自1962年至今，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已有40余年的历史。1973年和1978年，他曾两次参加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对浙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他多年来所做的田野工作主要是宁波的城市考古和越窑青瓷遗址的发掘。

1972年林士民先生主持宁波市区和义路唐代遗址的发掘，这是宁波城市考古的序幕。此后他又主持发掘了东门口码头、市舶司、天妃宫、高丽使馆、子城、罗城（东门段）、渔浦城门等一大批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除了城市考古之外，他还主持过宁波三江附近一些古墓葬和瓷窑址的发掘工作，积累了许多珍贵的资料。1984年浙江省开展第二次全省文物普查，宁波地区的普查工作在林士民先生的带领下，查到各类遗址269处，为宁波后来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林士民先生工作勤奋，思路开阔。他生活在东海之滨的宁波，这里是天然的良港，秦始皇置郡县，把宁波称为“鄞县”。“鄞县”的地里位置大致在鄞县之东，鄞山之北。“鄞县”是因鄞山而得名的。据《方輿胜览》引《四蕃志》，鄞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可见早在先秦时代，宁波的海上贸易就已闻名于世。自秦至今，宁波的海上交通一直在中外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林先生有鉴于此，就在认真研究考古材料的同时，把视野扩大到海上交通史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撰写的发掘报告、简报、论文达百余篇，其中一部分是林先生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及香港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发表的，也有一部分以英、日、韩等文字发表于国外考古学或历史学的杂志上。他的一些论点，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认可与赞同。例如宁波港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始发港；宁波是东亚文化圈形成中重要的角色之一；宁波是汉文化输出的主要窗口；在文化交流的问题上，他提出了深层次与浅层次的区别。这些新看法与新观点，集中的反映在1990年以来他撰写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1991年中国海洋出版社）、《青瓷与越窑》（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2002年宁波出版社）、《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与沈建国合著，2002年宁波出版社）等著作中。

林士民先生立足本职，深入实际，不断探索，把文物考古事业作为毕生的追求，因此，在1985年被评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工作者，由文化部授予奖章。国务院表彰他“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1987年林士民先生以16项

考古发掘、调查的实践与理论成果，在省职称高评委评审中，被首批授予副研究员资格证书。到1993年又以14项考古调查和35项研究成果，取得了研究员的资格。

林士民先生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宁波港“海上丝绸之路”，是全国较早的、活跃的研究者。他的专著《青瓷与越窑》问世后，深受国内外学者的欢迎，并曾多次获奖。

近年来，国内外有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宁波与宁波港，他们很需要文物考古方面的新的研究资料。为了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在各市、县、区文博单位的支持下，林先生从论文、考古报告、简报等百余篇文章中，精选了三十余篇，题为《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交付出版。我深信此书的出版将和《青瓷与越窑》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我祝贺林士民先生在学术领域中取得的成就。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五日于杭州

（毛昭晰，浙江大学教授，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序

徐 苹 芳

我国有很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又有精良的造船航海技术，但始终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发展成为海洋国家。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作了分析，既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人文因素，也有地理和环境上的自然因素。在这种历史和地理的背景下，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形成了若干有中国特色的港口城市，它们出现于秦汉时期，至唐宋而增多，自南向北如广州、泉州、福州、明州（今宁波）、扬州和登州等，其特点是：

第一，由于中国海岸主要是沙滩，很少出现崖石岸边上的近海港口城市，一般都在距沙滩海岸较远的地方兴建城市。

第二，这些城市在形成过程中都选择建在一条通海的大江河之滨，如广州建于珠江北岸；泉州建于晋江北岸；福州建于闽江北岸；明州建于余姚江之南、奉化江（鄞江）之北，东接甬江的“三江口”上；扬州在长江之北，与南北运河相交，元代以后通海港口东移太仓刘家港。在入海口外的海域多有岛屿形成港湾，如泉州之三湾十二港，明州之定海和舟山诸港。

第三，这些城市在形成港口以前，已经作为地方城市而存在。中国地方城市郡州县城都是地方行政衙署治所，为该地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布局皆以衙署（子城）为中心。如广州城始自秦汉之番禺城，西汉初年南越王宫署遗址已被发掘出来，即今广州旧城的中央。泉州城初建于唐，呈长方形，四门十字街，衙署在西北；五代王审知以此为子城，扩建罗城，宋初又扩建东、西门外关厢和北城之地，泉州城呈不规则的“鲤鱼状”；南宋时又在城南“蕃坊”增筑翼城，濒临晋江岸边。始建于西汉闽越王之东冶城，在今福州旧城内之屏山南麓；晚唐在此建子城为衙署，五代王审知建罗城，两次向南扩展，福州城直逼闽江。明州城先于唐长庆建子城，唐末景福年间再筑罗城，子城为州衙，位于全城北部稍偏西，鄞县衙则在其东，东门外沿江筑码头。汉广陵城建于扬州蜀冈上；隋在此建江都宫，唐为子城，唐中期以后在子城南扩建罗城，开坊市，规整的方格网状街道尚遵唐式；运河经城内，晚唐时改道南、东城垣外；汉唐之间，长江北岸自蜀冈下逐向南移至瓜州渡与运河接轨，扬州终于失去作为海港城市的条件，而回归为地方城市、江北运河上的水运枢纽。

山东半岛的登州城（今蓬莱）与上述诸港口城市不同，汉武帝时筑小城于海边。今城为明代所建，四门十字街，有钟鼓楼，城北建有水城，城中可泊海船。历来为军事要塞。登州也是通往朝鲜和日本的主要港口。

中国古代诸港口城市对外航线，南面的广州、泉州主要对东南亚和南亚，北面的扬州、登州主要对朝鲜和日本；而明州港适在其中，则兼顾南北两面的航运，特别引人注目。明代海禁，中国沿海航运业全面衰落。

中国古代著名的港口城市，都作过考古工作，而宁波城市考古是较多的，发掘过唐代以来的明州罗城城门、城垣，子城遗迹也作了大面积的勘察，在罗城内月湖附近发拙过宋都酒务、高丽使馆和“则水碑”及碑亭遗址，在东门口发掘过宋代不同时期的码头和宋代海船遗迹，还在城东发掘过元、明、清三个时期的天后宫遗址。这些考古工作都是林士民先生主持或参与的。记得我第一次与士民先生见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正在发掘整理宁波天封塔塔基出土的文物。宁波考古能够取得这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士民先生长年不懈的辛勤敬业工作是分不开的。他的这本新著正是他在实际的田野考古基础上，绽开的学术之花。

2005年春夏之交，士民先生寄来《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书稿内容，约我写序。全书的主要内容，以前刊物上多有披露，考古学界很尊重信任第一发掘者的论述；所以，我首先向读者推荐士民先生的新著，也借写序的机会略陈中国古代港口城市 and 海运的特点，以附骥尾。

谨序于2005年9月1日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 序

陈 炎

溯忆1981年冬，在宁波举行“宁波港与海外交通史”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与林士民先生相识，一见如故。在这以前我曾拜读过他的大作，知他对宁波文物考古、城市和海港的建设以及对越窑青瓷的研究造诣颇深，成果累累。在这次讨论会上，我又聆听他的高见宏论，颇多真知灼见，受益匪浅。因为我俩是宁波同乡，又对海交史都感兴趣，因此，这次会议就成为我俩以后莫逆之交的机遇。

同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我在大会上曾首次在国内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并先后在《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的论文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当时海洋出版社社长张海峰先生与我商量，要我推荐组织一些研究我国海港城市学者的名单，为该社撰写《海上丝绸之路》丛书，由该社出版。在名单中，我向他推荐由林士民先生撰写《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一书，并请我的老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朱杰勤教授为该书题签。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好评，我也为此感到高兴。从此，故乡宁波举行各种学术会议，他也热诚推荐我参加。20多年来，我俩在学术上一直互相切磋，彼此砥砺，“相处以诚，相濡以沫”。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林先生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自强不息，不断创新。特别是在研究宁波港与海上丝路和宁波城市发展史方面，近几年来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又发掘出一批唐宋元罗城、子城、宋代高丽使馆、东门口码头、东渡路市舶使等极为重要的遗址，这些考古发现，不但获得了比文献记载更确切、更可靠的珍贵佐证，而且也为研究宁波城市和海港建设的发展以及与海外各国友好交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欣闻上海三联书店将出版林士民先生撰写的《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一书。该书内容充实，资料富赡。作者全面系统地运用几十年来积累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立论有据，有所发现，是作者近20多年来研究的成果；也是继他出版的《青瓷与越窑》巨著之后，又一部在学术上难能可贵的姊妹佳作。她们的问世，在学术上放出了异彩。重温书中宁波城市和海港建设发展的历史，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对入世后正在跻身于现代化国际港口都市的宁波港，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热诚祝贺该书的出版。是为序。

2005年9月8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时年89岁

（陈炎，北京大学教授）

# 导 论

## 一

宁波是我国一处著名的海港城市，在20世纪末，已步入世界亿吨级大港行列。在中国，除香港特区外，宁波港在我国港口吞吐量排名第二，在世界上则排名第五。其实，宁波这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早在东汉晚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大量的出土文物中的舶来品，就证明了这一点。唐代已成为大唐国中交州（现越南）、广州、明州（今宁波）、扬州四大港之一。北宋为三大港之一，又是“三司”之一，即杭州、明州、广州三地设市舶司。南宋时明州市舶司直属户部。元代仍为三大港埠之一，也是“三司”之一，即广州、庆元（宁波）、泉州。明代，实行“海禁”后，朝廷指定广州通东南亚诸国，泉州通琉球，明州通日本等。清代全国设立四大海关，宁波为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就设于江北岸。纵观历史，宁波这座港口城市在1840年前，是属于中国强大的汉文化输出的主要窗口之一。1840年后，由于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商埠，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这时才吸收了西来文明。宁波自古以来，被称为东方大港。这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值得我们珍惜。

翻开漫长的“地书”，再次证明了这座港城有着极为丰厚的历史底蕴。有着七千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作者亲自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遗址发掘工作，遗址中出土的七千年前独木舟、木桨以及陶舟、海洋动物遗骸。使我们感受到早在七千年前，宁波的先民们已经吹响了向大海进军的号角。

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对宁绍地区，特别是宁波地域的原始文化作了上下七千年的综合分析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河姆渡文化”它的发展、演变序列。对宁绍地区的良渚文化的研究，以往很多学者都把它当作是从浙北或太湖四周涌入宁波地区，也就是说，宁绍地区良渚文化的出现，是受到外来良渚文化的影响，即所谓“涌入论”。通过对遗址内涵的研究，C14年代的排比，我们对“涌入论”给予了否定。事实是，宁绍地区的所出现的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准器，其时代大大早于浙江钱塘江以北的良渚文化。

文化传播、交流，不论古代、现今都是存在的，以河姆渡的石铤而言，它的发生、发展、传播，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通过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铤传授路线、范围、演变与分期，使我们看到了它在古代文化交融发展中的作用。

土墩与土墩石室是两种不同的建筑，其内涵属于商周时代的一种文化，它与宁绍地区商周遗址一样，反映了这一地域、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为研究商周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

水下考古是一门新兴的考古。宁波象山港水下考古于新世纪中国浙江属首次，这次水下考古仅青白瓷一项就出土了1500多件。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还为宁波成立水下考古工作站授了牌。

明州为兴盛的港口都市。从明州唐、宋子城的，唐、宋、元罗城的发掘资料表明，在长江以南的州级政权机构中，明州是我国著名的一座不冻不淤，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和港口都市，从城池构筑的规模、工艺，在长江以南可算是十分讲究的。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这一类的正式发掘报告。

反映一座港城繁荣，码头遗址揭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从北宋开始，明州已能打造“万斛”船，不但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在世界上亦有名望。出土的宋代海外船，安装的舳龙骨，比国外使用舳龙骨要早六个多世纪。作为港城航标的天封塔，该塔地宫的发掘，出土了好多件国家级文物，与南宋绍兴十四年纪年铭文一起出土的140多件文物，对研究各个领域的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建筑模型的出土，填补了南宋殿堂建筑上的空白。和义路唐代遗址发掘，揭开了姚江边唐、五代、宋渔浦城门、造船场、码头与仓库遗址的面目，大量越窑青瓷的破土而出，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是建国以来陶瓷考古史上罕见的一次，因此国内外许多陶瓷考古学者，多次来宁波考察研究这批珍贵的资料，为频繁的学术交流又打开了一处大门。

古墓发掘，反映了宁波城市葬地的一个侧面，出土文物对当时宁波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海防历史遗迹的考古调查，展示了浙东一带的海防军事设施的规模、演变历史，它们在为保卫宁波港“海上丝绸之路”中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勾划出一幅生动的军事设施分布图。

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宁波这座海港城市的发展优势，从晚唐一直延续到元代。宁波从北宋开始，建有一整套的市舶机构，随着造船业的发达，推动了东亚贸易圈的蓬勃发展。新罗张保皋商团和明州商帮，是这个贸易圈中的主要力量。明州商人侨居各国，对推动各国的经济、文化，书写了光辉的史诗。目前发掘的遗址和保存的宫、馆（会馆）合一的天后宫，就是历史的见证。在商品输出上，浙江宁绍地区是越窑生产基地，尤其是慈溪上林湖，则是唐宋以来的中心窑场，大批贸易陶瓷生产于此，源源不断的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运销世界各地，最远的可达到非洲埃及等古代城市。通过越窑的外输，和我国其他窑口生产的陶瓷器，经明州（宁波）港运销。明州港是“陶瓷之路”始发港，越窑瓷器论年代最早打入国际市场，论地域在全世界亦最广，而且像唐湖南长沙窑器物，宋元龙泉窑器物都沿着越窑青瓷所开拓的道路，代代相传。已为国内外许多遗址发掘资料所证实。

宁波港不仅仅是商品输出的口岸，而且也是中国汉文化输出的主要窗口，在构筑形成东亚汉文化圈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佛教、佛画、雕刻、建筑等的传播，直到目前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还保存了大量的遗存和遗物。这些遗存和遗物是中国周边诸国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也是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值得一提的宋丽交往中，将浙东越窑的制瓷技术直接传授到了朝鲜半岛，使半岛的制瓷业，由一个进口越窑的国家，一跃成为瓷器

输出国。又例如到了宋代明州阿育王寺、天童禅寺等成为佛教东传的中心圣地。外国不但派高僧来这里留学，归国后成为某一派佛教的一代宗师，而且还请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的著名高僧到日本等地传教，创建寺院，成为该国某派的一代宗师。这些文物史迹在邻国目前都作为国宝进行保护，有的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二

城市考古是运用遗物、遗迹来研究一个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明州（宁波）建成以来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据《宝庆四明志》记载：“罗城周围长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许，计一十八里。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唐末刺史黄晟所筑。”这么几句话很难使人们对古城、特别是古城的变迁历史有所了解，而且构筑规格、工艺，在古代文献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因此要想了解唐、宋、元代城区的历史，只有靠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积极配合城市建设、旧城改造，作者先后主持发掘了一批有价值的遗址遗迹，现择有代表性的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作一叙述：

### 唐代罗城门基址

1973年，环城马路挖防空洞，在东门口，我们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发现唐代的东渡城门遗址；在和义路发现宋代城门遗址，称“渔浦门”，是东渡门西北角的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外直接通向集市，从出土的大量精美越窑青瓷证明，是一个陶瓷贸易的集散地，另一方面也是水产类货运集散地，因此名为“渔浦门”。再往下挖是五代城门。在挖开的唐代地坪上，能清楚地看到唐城门是一次性构筑成，全部用长方形砖头砌筑。城门分为东西两壁，当门道清出后，发现唐城建筑十分讲究，城的外壁全部包砖、门道地坪都经过加工，墙基打了成排的木桩，似梅花形排列，称梅花桩，其上砌砖。从发掘出来的城墙、门道展示了明州唐、五代、宋三个朝代的城门建造的规格、工艺及江南城门的风采。

### 宋代码头的发掘

1978年，宁波市东门口的“交邮大楼”筹划施工。我们对交邮大楼范围内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发掘中，我们发现了石砌的海运码头，后顺藤摸瓜又挖出了三座由西向东扩拓的码头，由此证明越靠近奉化江的码头，其建造时间越晚。我们把建造晚的称三号码头，一号码头为最早，从出土的遗物表明均是北宋到南宋时代的码头。

三号码头出土了北宋年间铸造的“大观通宝”和南宋的“绍兴元宝”等钱币。还出土了古陶瓷等文化遗物，典型的有南宋晚期的龙泉窑鱼儿瓶、炉、碗，江西景德镇的影青仕女卧枕、影青瓶以及黑釉器等等。二号码头中清出“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等钱币和宋代的青瓷器。

一号码头和三号码头相距20米，出土了越窑、龙泉窑的瓷器碎片，小长方形砖以及“太平通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钱币。

三个石砌码头位置的逐步延伸，从年代看以一号码头为最早。它靠近唐代的东渡城门，建筑在唐代的地坪（文化层）上，随着奉化江的发育和江泥堆积，江面变窄，使这个北宋时代的码头，失去使用价值，终被废弃；于是又在淤积成陆的地上兴建起二号石砌码头，这个码头是构筑在宋代淤积地坪上。随着江岸的变迁，到了南宋时又新筑了三号码头。东门码头的发掘，构划出了宋代江夏海运码头的具体位置、规模与构筑工艺以及重建、废弃的变迁历史。尤其一号码头由于成陆时间早，基础结实，所以码头底部没有打桩。二、三号码头不仅打有大批木桩，而且还布有大批木头和柴梢。这种做法与李明仲著的《营造法式》所载“码头布柴梢令厚一丈五尺，每岸长五尺钉桩一条”之制相似。

### 宋代海船的出土

1979年4月，在发掘三号码头时，发现了一艘宋代外海船。出土时船的色泽灰黄，形态、构件都很清楚，但经阳光照射后，水分蒸发，收缩率很大，构件变形、断裂。我们请了武汉水运学院席龙飞教授等专家到清理现场作指导，这条宋船的考古、发掘，由于认真细致的测量记录，使该船得以科学复原。由于宋代海船在全国发现不多，因此新闻媒体十分关注这项考古新发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均发布了“宁波出土宋代海船与海运码头”的消息，一时影响很大，引起了考古界、造船界的关注。上海、大连、武汉等地造船专家纷纷来函，对出土的宋船进行研究。这次出土的海船，为明州造的海船船型提供了最好的实物例证，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史和造船技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 天后宫遗址清理

江夏街天后宫，又称灵慈宫、天妃庙，所祀之神乃福建莆田人林氏女子。信徒山船运业行会的成员组成，所以亦称福建会馆。由闽商贾捐资修建，成为城东一座壮观的著名建筑。1949年遭毁。1982年因兴建展销大楼，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340平方米，从而揭开了天后宫建筑历史、规模、规格的原貌。第一次的殿宇建筑为三开间，第二次殿宇建筑与第一次同。第一、第二次建筑中所出土的大量元代龙泉窑青瓷器物碗、盘、洗等，证明其时代应为元代。第三次建筑由大殿和前殿组成，都是三开间。前殿、正殿出土的明代青花器与室内地坪铺设明代特征的小方砖和底部经过绿沙面加工的情况，其时代应为明代。

第四次建筑规模扩大，包括月池、前殿、戏台、月台和正殿。这一层中出土的“康熙年制”等青花款的小杯及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重建敕赐宁波府灵慈宫记碑”，证明该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

第五次建筑，在轴线上布局与第四次相同，唯月台有扩大。这次建筑采用了大量的砖饰和石雕龙柱，显得十分讲究。从出土的龙柱上铭文和道光年间的一批青花瓷证明，该建筑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文献记载相符。

通过这次天后宫遗址发掘，证明该遗址元代建有三开间的殿宇，到明代由前殿、正殿组

成。清康熙时扩建月池、戏台。清咸丰时对上述建筑进行重建和扩建。这就是江夏天后宫建筑历史的演变经过。

### 罗城城墙的考古

1993年华联集团第二期工程要上马，其位置又处于古代东渡城门。考古发掘计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正式动土发掘。仅半个多月时间，就揭露了100多米的古城墙基，经确认是唐代构筑物。五代、两宋到元代都延用了唐代的城墙。

在宋代城墙的西壁，发现又一道石砌的城墙，通过剖析，是具有元代特征的柱础石和方孔石，这是后来重建的元代城墙。这在长江以南第一次发现元代城墙边突出的一个台基，这个台基我们称它为“窝墩”。在墩的清理中，出土了高丽嵌镶青瓷及大批元代龙泉窑青瓷。宋城的揭露，显示了城墙真容。宋城基础部分两侧全部用大量的条石砌迭，到一定高度后，城墙的两侧则包以砖，砖砌城墙规整、有序。其内心大多利用唐城堆土。宋城构筑工艺之讲究，牢固程度，远超唐代。

唐代明州城墙，保存最明显的是城墙内的填土部分，这些土城内芯的泥土，从剖析证明有的地方是经过夯筑，而且是在建城时从异地搬运来的，所以土色、土质完全与唐代地坪面上的土色、土质断然不一样。从伴出的文物表明唐城始建于公元894-898年间是可信的。千年古城之谜第一次被揭开了，这不仅为我们重新书写明州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而且大大丰富了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 子城发掘的前后

1995年，市政府对公园路步行街实现改造，而公园路地块，正是《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六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即公园路街区。中房宁波公司作为开发单位，曾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在论证中，北京等地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保护、发掘唐宋子城的问题，特别是地下历史遗迹必须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遗址的大小，作适当的原地保护；对现存地面的文物要整修。总之多数学者认为对该地块的改造一定要慎重。

1997年1月，公园路唐宋子城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在拆迁面积几十万平方米中，如何寻找唐宋子城城墙遗迹，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步。我们采用“由面到点，抓住要害，顺藤摸瓜，搞清为止”的发掘方法，终于在不同的部位中寻找到了唐代子城墙和北宋、南宋两个不同时期子城修建、扩建的城墙段，这次清理、勘探一百多米城基和护城河遗址，从而勾划出了唐宋子城位置、构筑工艺和它们的演变历史。

寻找城中主要衙署建设、公共设施，是这次发掘的另一个目的。再现鼓楼中轴线上宋代的官衙基址和它的东侧花坛、大道以及其他建筑。在这些建筑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城中的公共设施水（污）沟和道路。唐代的水沟与污沟是不同的，前者是为防止城内积水的下水道，因此构筑牢固，但无生活垃圾，所以在清理中淤泥无气味。后者污水沟即生活污水的排放，其构筑比雨水沟更讲究，均用石板封盖，在沟中带有臭味，并有小动物骨头等杂物垃圾。

在子城内不仅仅出土了大量的唐宋越窑青瓷，宋元龙泉窑青瓷和江西景德镇瓷器等。还

出土了元代均窑器和唐代的波斯陶器。以往大量的越窑青瓷在阿拉伯、波斯地区出土，而这次波斯陶实物在子城出土，这证明明州在唐代确实与波斯地区有着交往，相互出口陶瓷器的事实得到了佐证。

事后，中房宁波公司还对在公园路发掘区内的清代考棚建筑作了维修，将遗址发掘经过，唐宋子城衙署范围、规模及其历史的演变和具体城墙、城河的规格、建筑及花坛、大道、水井、水沟（污沟）位置等均刻碑嵌于新建筑上，传之后人。

## 月湖考古的始末

在国务院批准的《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里明确规定的六处历史文化保护区中，月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域，1999年4月，市政府结合旧城改造，对月湖东岸进行全面整治，迁移居民3000多户。为保护历史文脉，对月湖的地下文物进行考古发掘，以丰富这一历史地段的文化内涵。

这次月湖划定考古面积9800平方米，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寻找北宋时期由大宋王朝批准建造的高丽使馆遗址；二是寻找南宋时建造的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则水碑亭遗址；三是寻找南宋明州官营的“都酒务”遗址。

都酒务是宋代明州官营酒业专卖的代表。文献记载中只提到“（月湖）北有酿泉，其甘如蜜，当时酒务于此焉”。经过调查发掘，都酒务遗址建筑的发现证明明州官营酒的作坊曾设在现宝奎巷一带，其范围从出土物证明也更具体，这对研究宋代明州酒的专卖业有一定的价值。北宋高丽使馆基址的发现。“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这是宋舒懒堂在明州杂诗中描写的高丽入贡使者船队浩浩荡荡进入明州城内的盛况。这与文献上所说高丽使者一般乘船从长春水门进入明州城内、纵渡月湖的记载相一致。我们发掘的高丽使馆遗址，已揭露一幢大房子，一个天井和另一幢房子的局部。从大院内柱础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在柱础基础上，出土了公元1111年铸造的“政和通宝”钱币，北宋晚期的高丽青瓷器残片和北宋越窑青瓷制品碗、盘等残器。尤其是高丽青瓷残片和“政和通宝”钱币，与使馆建于政和七年（1117）相吻合，这是历史的实物记载，而不是历史的巧合。

“则水碑”及碑亭的发掘。从碑记中，记载了公元1259年州官吴潜重视实际调查，亲自测量了沿海各闸所在河段水位与农田水位之间的高程关系，同时也测得平原地区月湖平桥的水位，将明州城西、城南等水位统一换为平桥处水位。测水标尺为一“平”字碑，水淹“平”字则通知各地开闸泄水；水位线位于“平”字则立即命令闭闸蓄水。经实测，该“平”字的笔画高度与现在黄海海拔高度基本相符，“平”字第一横上为黄海海拔高度1.65米，第二横为海拔1.36米，最下端为海拔1.09米，与现在的常年水位1.33米基本符合。由此可见“则水碑”的水位测量技术在当时已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它的设立，有效地提高了防汛抗旱的能力，为开发宁波平原，为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现今则水碑亭是月湖景区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目 录

|                        |     |
|------------------------|-----|
| 题词·····                | 鲍贤伦 |
| 题词·····                | 汪齐英 |
| 毛昭晰序·····              | 1   |
| 徐莘芳序·····              | 3   |
| 陈炎序·····               | 5   |
| 导论·····                | 1   |
| <b>第一章 丰厚的文化底蕴</b>     |     |
| 从宁绍地区的遗址看河姆渡文化的发展····· | 2   |
| 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      | 14  |
| 论河姆渡文化中的石铤·····        | 24  |
| 宁绍地区良渚文化研究·····        | 38  |
| 浙东沿海土墩遗存探索·····        | 43  |
| 宁波钱岙商周遗址试掘简报·····      | 48  |
| 象山港水下考古纪实·····         | 56  |
| 宁波考古述略·····            | 59  |

## 第二章 兴盛的港口都市

|                     |     |
|---------------------|-----|
| 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中、英文）   | 72  |
| 浙江宁波东门口罗城遗址发掘收获     | 101 |
| 唐宋明州水利遗迹考           | 106 |
| 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       | 111 |
| 浙江宁波北仑古墓发掘报告        | 148 |
| 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中、英文） | 172 |
| 保国寺                 | 212 |
| 天一阁                 | 214 |
| 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       | 217 |
| 浙东海防历史遗迹调查与研究（中、日文） | 243 |

## 第三章 繁荣的“丝绸之路”

|                      |     |
|----------------------|-----|
| 明州市舶史略               | 252 |
| 浙江宁波市舶司遗址发掘简报        | 261 |
| 明州港的造船业              | 269 |
| 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        | 280 |
| 东亚商团杰出人物——新罗张保皋      | 290 |
|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圈之研究         | 296 |
| 浙江宁波天后宫遗址发掘          | 307 |
| 庆安会馆与会馆文化            | 324 |
| 近代宁波商业和商人            | 333 |
| 试论越窑青瓷的外输（中、英文）      | 337 |
| 宁波港出土的长沙窑瓷器          | 380 |
| 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景德镇宋元时期的陶瓷贸易 | 392 |
| 宁波出土磁州窑瓷器之探索         | 397 |
| 越窑与汝窑的对比研究           | 401 |
| 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景德镇青花瓷的外输    | 407 |

## 第四章 频繁的文化交流

|                                 |     |
|---------------------------------|-----|
| 明州港在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           | 414 |
| 日本遣唐使入明州地点考（中、日文）·····          | 420 |
| 从明州港入唐的日本头陀亲王·····              | 436 |
| 宁波现存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华侨刻石之研究（中、日文）····· | 441 |
| 浙东制瓷技术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中、韩文）·····      | 458 |
| 中国浙江越窑对朝鲜半岛制瓷业的影响·····          | 479 |
| 对高丽青瓷之研究（中、韩文）·····             | 482 |
| 宋丽江南交往的历史遗迹                     |     |
| ——明州（宁波）高丽使馆遗址发掘剖析·····         | 498 |
| 后记·····                         | 505 |